



1924~1925 年孙中山对非基督教运动的 认识及其影响研究

陈海军*

关于 1922~1927 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学界已有许多论著问世,但对于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仍然缺乏系统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发掘史料,梳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在 1924~1925 年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认识,构建革命洪流中的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与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以期对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

1924~1927 年的国民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时期。1925 年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高扬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对在华基督教会及其事业采取限制、排斥的政策。大革命期间,革命军所到之处,基督教会都成为国民革命的打击对象。无疑,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 1924~1927 年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学界已有许多论著问世,但是这些研究仍然不能说是足够的和充分的。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没有对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探讨,研究者对于 1924~1927 年间中国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历史原貌缺乏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发掘史料,梳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在 1924~1925 年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认识,构建革命洪流中的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与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以期对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认识。

* 陈海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一、1924 年之后孙中山对于帝国主义、民众力量的认识

中国近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最初发生于 1922 年,其时正值“五四”之后,其直接起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年会当年 4 月在北京举行,刺激了以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发表反宗教宣言,以此为嚆矢,非基督教运动兴起,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非基督教运动在此后逐渐低落,但在 1924 年之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逐渐兴起,非基督教运动也重新发展起来。

就历史背景而言,1924 年以后重新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不仅与 20 年代包括精英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基督教的认识存在密切联系,与中国国民党在 1924 年以后对帝国主义与民众力量的重新认识亦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与民众力量的重新认识不仅事实上为非基督教运动的重新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亦为其自身最终确立支持和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政策提供了可能。

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对帝国主义、基督教和民众力量的认识,对于非基督教运动在国民革命期间的发展,对于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1924 年之后孙中山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对帝国主义寄予希望,以为他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但是无情的现实使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先生转而开始反对帝国主义。1924 年 1 月 6 日,孙中山发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第一次公开谴责了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号召各政党、各阶层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①。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更明确宣布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为政治纲领。此后,孙中山一再反复阐述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罪恶。

在国共两党合作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中国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反帝运动迅速高涨。国民党一大确立的新对外政策第一条明确表示:“一

^①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3~24 页。



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①由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与中国民众中的地位与影响,国民党所奉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接受,一场以打倒列强为宗旨的国民革命即将席卷中国。基督教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中,因其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联系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基督教的模糊认识,成为革命所打击的重要对象。而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党的纲领的中国国民党人亦将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性而支持这一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

国民党员张宙 1925 年 2 月发表在《京报》上的文章指出了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与非基督教运动之间存在的关系。张宙指出,“一九二四年改组后之国民党,其目标对内则欲争得民众之自由,对外则欲获得中国民族之独立。……欲获得民族独立,势不得不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此为国民党今后精神之所寄托”,“然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不仅经济侵略之一端也。至其文化侵略,亦不得不防范之”,“其文化侵略,则在毒腐我国民之思想,而减少其反抗精神,因而得以随其吞噬之野心”,而“基督教者,即文化侵略之一种方式”。因此,“若就争取民族独立之观点而论,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吾人故当奋力反抗,即其文化侵略,基督教之传布,亦不能不与以猛烈之反抗焉”。^②张宙的论证环环相扣,逻辑推演相当流畅。他虽然没有注意到基督教并不能等同于文化侵略,但是他的论证对于说明从党的纲领出发国民党为何能够容纳和支持一个非基督教运动立场是很有力的。

(二)1924 年之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认识

孙中山来自民间,对于广大民众的疾苦,原有深切的了解。但是,长期以来他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缺乏认识,只知借助军阀的武力从事革命斗争,并未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致使革命理想在军阀的不断倒戈和出卖中破灭。

1925 年 3 月 23 日,维经斯基(G. Voitinsky)在为悼念孙中山而作的《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一文中指出:“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孙中山更注重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而不注意唤起中国民众去反对帝国主义。显然,他还不懂得,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非有一个依靠民众的革命政党不可。”“国民党没有全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95 页。

^② 张宙:《读〈国民党与基督教〉后致孙科先生》,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 1980 年版,第 385~387 页。

力参与全国的政治生活……其原因在于,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反帝民众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这也不是国民党如同西方改良主义政党历来表现的那样,背叛人民群众,而仅仅是它不相信民众。国民党虽然接近人民群众,但它对于本党,对于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巨大力量仍估计不足。”^①

五四运动所显示出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使孙中山深受鼓舞和启发,促使他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改变过去对人民群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他在总结屡遭失败的原因时,也开始正视没有发动和依靠民众这一致命弱点。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②同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心力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③

国民党在一大之后,在苏俄和共产党的影响下,高度重视民众运动。国民党的革命路线不再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党以及军队,它开始努力动员、教育以及组织工人、农民、士兵与学生。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能也。”^④国民党开始注重群众运动,这为它后来确立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讲,是一场民众运动,只有国民党改变对民众不信任、不依靠的态度,国民党才有可能积极支持和推进非基督教运动。国民党一大宣言还指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于事实上证明之者。”^⑤这表明国民党同时亦清楚认识到,支持与开展民众运动不仅可以打击帝国主义敌人,还能够巩固和扩大革命组织。也就是说,国民党自身亦可受益其中。

这一切都成为中国国民党最终确立积极支持和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背景。通过推动非基督教运动,既可以组织民众,更可以推动反帝运动,扩大政权基础,

① [俄]维经斯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6~718页。

② 《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③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第591~592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第591~592页。



增强政权权威,而这些都正是中国国民党所希望看到的。

二、孙中山先生对基督教的认识

两广地区是基督教传播最早、影响最突出的地区,孙中山家乡又是毗邻香港、澳门这两处传教士的集中地,孙中山的学生时代几乎全部就读于国内外教会学校。孙中山少年时代即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这为他后来皈依基督教奠定了思想基础。1883年12月,17岁的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孙中山知识成长期中,教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受到了基督教教义影响也很大,他所倡导的平等、博爱,就是从基督教教义而来的。他性格沉静博大,待人诚恳和善,关心下层人民生活,注意民生问题,都与青年时代受基督的博爱、和平、平等思想影响有关。他认为基督教“是活的真理,可以实行的”^①,并承认他“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②。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技术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学习医科以后,孙中山对宗教神学也曾产生过怀疑,对基督教一度也持批判态度。但是孙中山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却还是始终坚持的。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基督教也发挥了重要的和积极的作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利用基督教为革命的手段,利用基督教堂讲演革命。他的革命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外牧师、教友和受教会学校培养、倾向于基督教的革命者的帮助。孙中山本人也曾多次凭借教会的保护摆脱清廷的迫害。

对于毕生信仰的基督教,孙中山怀有深厚的感情。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高度肯定了基督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的精神,他指出:“何谓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当佛教初来中国时,辟佛教者颇多,而佛教教徒,乃能始终坚持,以宣传其主义,占有强大势力。耶教亦然……盖其心以为感化众人,乃其本职,因此而死,乃至光荣。此所谓舍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③

而基督教所信奉的耶稣基督,在孙中山看来,则是带领遭遇灭国之痛的犹太人实行革命的领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孙中山赞扬耶稣:“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中国人,犹太人也是亡国。犹太人在耶稣未生之前,已经被人征服了。及耶稣传教的时候,他的门徒当他是革命,把耶稣当作革命的首

^① 陆丹林:《革命史谭》,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571页。

^② 《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7页。

^③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3页。

领,所以当时称他为犹太人之王。……当时耶稣传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①联系到孙中山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中对青年会的期望,可以看出正在革命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孙中山从内心深处深深赞赏和同情“耶稣与其领导下的犹太人所进行的革命”。

对于来华的传教士和基督教团体,孙中山亦多有肯定。在1921年12月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孙中山赞扬基督教传教士:“不独前在中国传教者,教堂被毁,教士被害,时有所闻;即在国外,新教亦迭遭反对。然其信徒,则皆置而不顾,仍复毅然为之,到处宣传,不稍退缩。”^②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演说,再度肯定了基督教在华进行的传教和教育活动:“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像教书的、传教的和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于不安分的,只有少数流氓。”^③

1924年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立25周年,孙中山应青年会请求写下《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他高度肯定了基督教会与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工作,赞扬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高尚坚强宏大的团体”,期望基督教青年会应当如同《圣经》中记载的带领以色列人至迦南胜地的约西亚一样,承担起拯救中国人民的重任。孙中山热情地勉励基督教青年会:“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西亚之任,以带领中国人民至加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诸君既置身于此高尚坚强宏大之团体,而适中国此时有倒悬待救之人民,岂不当发其宏愿,以此青年之团体而担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乎?”^④

三、孙中山先生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认识

孙中山对待基督教与教会及教职人员的态度前文已有详述,他的这种态度与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积极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的做法是有很大反差的。

对于非基督教运动,孙中山曾在运动初期(1922年春)发表谈话,表示:“予孰非基督徒者?予之家庭且为基督徒之家庭。予妻、予子、予女、予婿,孰非基督徒乎?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徒以我从事革命之秋,教会惧其波及,宣言去予,是教会弃予,非予弃教会也。故不当在教会,但非教义不足

①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页。

②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3页。

③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0~381页。

④ 《勉中国基督教青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538页。



贵也。教会在现制度下,诚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之可能。然如何起而改良教会,谋独立自主,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此教友人人应负之天责,亦为一般从事宗教运动者应急起为之者也。予奔走政治,不能为直接此项运动之参加,然予亦反对现在反基督之理论。”^①孙中山在谈话中清楚区分了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孙中山积极支持教会“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此即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但是对于反基督教运动,则表示了明确的反对。

但是,如果因此得出结论:孙中山将反对 1924 年重新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将是不合适的。在 1922 年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反对当时的“反基督理论”,而我们知道,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理论主要将矛头集中于基督教的信仰层面,与 1924 年以后以反帝为内涵的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完全不相同。所以,这个发表于 1922 年的谈话不能表明孙中山将反对 1924 年重新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圣三一学潮中孙中山的态度即证实了这一点。

1924 年 4 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发生学潮,从而揭开了非基督教运动第二阶段的序幕。圣三一学潮领袖梁福文回忆说:“四月十二日,我们三位代表向省长及大元帅请愿,要求收回教育权,要求取缔帝国主义者所办的学校。……中山先生在请愿文里作了亲笔批示:‘中国现在是没有自由的,汝等应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得到外国人之学问为是。汝等行动虽属幼稚,惟其志可嘉,今既被革,只有投学于他校而已;着邹海滨为之安置。’”梁福文记载道,有的学生对孙中山的批示感到不解,廖仲恺解释道:“他不是说中国现在没有自由么?他的意思是说在整个国家没有自由之前,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他已说你们的志可嘉,就是说你们还不错。”^②

由此可见,对待非基督教运动,孙中山 1922 年的态度和 1924 年的态度是存在差别的。^③ 1924 年以后,孙中山主张和积极推动反帝运动,这决定了他不会也不可能反对以反帝为基调的反基督教运动。不过,孙中山的态度也表明,尽管置身于他自己主张和积极推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潮流中,他对于基督教仍然

① 《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6 页。

② 梁福文:《记大革命时期广州圣三一学校的反帝学潮》,《广州文史资料》第 16 辑,第 169~179 页。

③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孙中山在 1922~1925 年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张子荣在 1987 年即指出:“孙中山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了解的加深,他的宗教观念逐渐淡漠。”张子荣接着指出:“由于他未能从根本上识别宗教具有麻痹作用,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故对帝国主义存有天真的幻想。这种认识直至 1923 年,严酷的现实才迫使他放弃旧思想,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张子荣:《孙中山与基督教会》,《晋阳学刊》1987 年第 6 期)张子荣没有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区别开来,将孙中山基督教观念的逐渐淡漠等同于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宗教观念的淡漠原因则来自于对西方国家的深入了解。显然,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

保持一份尊重和爱护的心态。在他内心,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正因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在孙中山内心有如此明确的界限,孙中山才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对基督教的信仰,直到临终要求为自己举行基督徒的葬礼。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最后的遗嘱中,他承认是一个基督徒,要用基督教仪式,殡葬他的遗骸,因为他觉得一生的生活与他努力的革命事业,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①。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基督教徒。孙中山曾经很担心作为基督徒的宋庆龄在自己身后的处境,在临终前曾特意嘱咐何香凝:“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待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而歧视之。”^②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当时用基督教仪式举行丧礼,曾经引起国民党同志中一部分的反对,孔祥熙等为此事通电解释,而素来反对基督教的汪精卫,为此事也曾有过说明: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徒,临终并不否认,当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孙夫人和孙哲生主张在协和医院行基督教礼仪,但有一部分的人反对,我在当时却是放任的”^③。

孙中山虽然在非基督教运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不到一年即去世,但是由于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他的态度必然将对此后的非基督教运动产生影响。由于此时许多国民党领袖、普通党员、民众已经在头脑中建立了“基督教=帝国主义”的公式,孙中山的这种态度使得非基督教运动在他逝世后一段时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孙中山要求举行基督徒葬礼一事,使反基督教运动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缓和。国民党报纸的反基督教增刊也由于缺少材料和作者停刊了。广东大学每半月举行一次的反教会会议也由于找不到人演讲,听众又寥寥无几而停开了”^④。

兼有国民党员、基督教徒双重身份,后来还曾经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教育部次长等重要职务的朱经农在1925年指出:“有人说教会学校摧残爱国心,这也许是过论。世界同仰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出身教会学校,且是教徒。他的革命思想,民族主义,并未被摧残,并未被淘汰。”^⑤再如,同为国民党员、基督教徒

①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② 《与何香凝的谈话》,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③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④ 李瑞明编:《岭南大学》,(香港)岭南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年版,第67页。

⑤ 朱经农:《中国教会学校改良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6月),第8页。



的徐庆誉质问道：“基督教与国民党果互相水火，何以孙中山先生始终没有非教的言论，不但不曾非教，在他的三民主义中，还说外国教师在中国开医院，办学校，都是出乎慈善的动机；又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开全国大会，孙总理出席演讲，表示他对于青年会有深厚的同情和绝大的希望，孙总理的爱国热忱，岂居人后，若基督教系迷信的结晶，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岂有像孙总理这样的先知先觉，还能曲予优容而不加以攻击的理由吗？”^①这样的质问对于谴责基督教的国民党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难以面对的。一位反教者，漳州国民政府鲁监察很尴尬地辩解说：“信教自由。……不信教亦是自由。……孙中山总理是基督徒，但汪精卫、朱执信反对基督教，而孙总理与汪朱二先生并不发生冲突。”^②这样的辩解当然是无力的。问题只是在于，无论是朱经农、徐庆誉还是鲁监察，他们都没有能够像孙中山那样给基督教和帝国主义划出清楚的界限。

结 语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向来尊重和信仰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信教自由”条款明确载在孙中山先生亲手制定的民国临时约法。“信教自由”是反对非基督教运动者最有力的武器，不仅国民党内反对非基督教运动者依此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攻击的基督教会也依此款质问反教的国民党。无疑，“信教自由”符合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向的政纲，但是反帝情境下，反帝的反基督教运动亦具有合法性，这是国民党对非基督教运动产生分歧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反对帝国主义已经被国民党在 1924 年确认，原则与原则的冲突，使国民党自然分成了两派。虽然随着 1925 年下半年起革命形势的剧烈发展和革命氛围的高涨，国民党领袖逐渐放弃了分歧，终于在“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的立场上统一起来，但是还是无法回避这种令所有忠实党员焦虑的内心冲突。

孙中山清楚地意识到基督教作为信仰而言，与帝国主义、与侵略并无关涉。

① 徐庆誉：《我对于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的管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4 卷 1 期（1928 年 3 月），第 24 页。

② 陈筠：《基督教对于最近时局当有的态度和措施》，《文社月刊》3 卷 3 期（1928 年 1 月），第 13 页。转引自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91 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孙中山对基督教会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教会方面积极改良,努力谋求自立,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孙中山的温温劝慰与真诚鼓励对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那里,一方面亲手推动了以反帝、以打倒列强为宗旨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也保持着对其所信奉宗教的信仰,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与尊重宗教信仰切实做到和谐相处、并行不悖。